

# “一二·九”运动中的清华大学 南下自行车宣传队

○车队队员口述 孔祥瑛整理

清华大学自行车南下宣传队，原是1935年12月中旬，由一群热血青年学子自动组织起来的（在学生救国会备案）。这仅是“一二·九”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中一支小分队，是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的涓滴水珠。同学们满怀激情，骑自行车到国民党的巢穴——南京，抗议、揭露蒋介石召集“伪代表”聆训，破坏、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经过1300公里艰险的征途，深入乡镇农村，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宣传。凋敝穷困的乡村，沉溺在水深火热中凄惨困苦的人民，政治腐败，汉奸横行……沿途所见残酷的现实使他们触目惊心，而进一步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

1977年2月春节期间，钱伟长约请在京的车队队友们到家中小聚（清华大学照澜院16号），有吴瀚、伍崇让、张石城、徐煜坚、裴崑山、高葆琦几位（凌松如、任泽雨、沈海清3位同志已去世）。大家谈起那段难忘的历程，却像是又回到40多年前，骑着自行车在铁路边道上奔驰。他们都激情昂扬地叙说着，互相启发补充，谈笑风生，十分热闹，竟回忆起许多细节。谈了几个小时都还未尽兴，可惜以后再没能相聚。我根据他们的谈话录音，反复听写，一句一句地写下来，尽量保持言谈的原话和语气，整理成篇。先复写了十几份，给在京的队友们传阅、修改后，再打印多份寄给国内外的队友们征求意见，几经修

改、综合改写成稿，已是1985年春季了。由于同志们各自奔忙和生活、工作的变动，现在再一次写成定稿又相隔了15年，离那次聚会竟已23年了。

1992年车队队友曾小聚一次，会后有张石城、徐煜坚、裴崑山三位同志去世，近年又有高仕功、高崇照、誉文德、伍崇让四位同志去世。现在我们生存者也都是年届耄耋，两鬓霜华。战友凋零，更令人感到对当年的历史回忆弥足珍贵。

## 示威游行·自行车队的诞生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了我华北大部主权。11月，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日寇进一步逼近北平，日军演习的坦克公然耀武扬威地横行于王府井大街，在柏油路面上深深印着履带的齿痕。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为抗议日寇武装



自行车队摄于杨村

演习，在清华大礼堂门口贴出海报，标题：“请看今日竟是谁家之天下？”并挂出日军演习路线图。

12月初，北平学生救国会发出《告全国民众书》，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面对这惊心动魄、国事危亡的现实，爱国青年们必然奋起行动了。就在反动的冀察政委会要宣布成立的日子，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全市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清晨，我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一齐出发，奔向西直门，但城门紧闭，冲撞不开，竟不得和城里的大队汇合，只在城外进行宣传演说而返。当时有燕京大学的雷洁琼参加了我们的游行队伍。

12月16日，学生救国会吸取上次活动的教训，事先做了周密计划，安排一部分同学15日晚上先进城，住到西直门大街的东北大学宿舍，裴崑山、高仕功、钱伟长等是先进城的。16日清晨，我们到沙滩北京大学操场和北大的队伍集合，再出发到前门，沿途和各大中院校队伍汇合，还有许多市民们随地参加，约有上万人。雄

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人民的怒吼，震撼着灰色的古城。

另外在城外清华、燕京和农大的队伍，都在16日清晨先到西直门被阻，转到西便门，大家齐力撞开了城门，冲散了防守的军警，直奔宣武门。这座城门坚固厚实，大家齐声呐喊，可怎么也撞不开。清华女同学陆瑾悄然从城门下边的空隙爬了进去，要拨开城门栓，当即被捕。大队伍就在门外呼喊示威，要求放人，僵持不懈。记得是燕京大学的美国教师斯诺先生正在宣武门内采访，是他急速和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联系，说明情况，学校派人来和军警交涉，将陆瑾要回（以后陆瑾被学校劝退离校）。在宣武门外的队伍，坚定不散，进行宣传。这次游行，清华的大队长是司激，他身材修长，穿着蓝布棉袍，拿着话筒喊话，很有组织和领导的能力。清华的队伍一直是四人一排，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团结坚定。他原是学生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和其他三位同志——黄诚、刘毓珩（陈其武）、华道一，一齐被学校开除了。

记得将近傍晚，学校来了几辆大汽车接体弱的同学，大部分同学是步行回校的。

### 游行示威后，总罢课了！

反动当局慑于学生运动的崛起，急于涣散和分化学生的力量。蒋介石政府指令全国大中学校，提前一月放寒假，放假期间又限令学校指派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聆训”。面对这一形势，有些同学



1988年，“一二·九”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队队员聚会于钱伟长家

## □ 口述历史

不知所措，不少离校返乡了。人心彷徨不定，已经掀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要走向哪里？已成为多数同学公开议论的新课题。我们一些观点相近的同学——钱伟长、高葆琦、裴崑山、曹国枢、沈海清、郝威等同学常在一起议论，认为不能像“九一八”、“一·二六”那样，运动过后就沉寂下去。要使运动的影响扩大，并且坚持下去，就要像俄国革命前夕那样，“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

我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由当时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形式，在同学中间传播动员，得到普遍认识的结果。北平学联更具体地在群众中宣传贯彻党的这一主张：爱国的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武装抗日力量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后胜利。并提出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的号召。由于群众认识趋于一致，很快得到了同学们的积极响应。

因为当时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里，学生运动正受到更严酷的压制。我们决定要南下扩大抗日宣传，要与南方的学生通气，声援他们的斗争，还可走一路，宣传一路，撒下抗日思想的火种。同时，南下宣传抗日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对国民党当局卖国政策的抗议。可是，该怎么走呢？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北平学生曾经卧轨，南下乘车请愿，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一二·一六”以后，南下列车已经停开几天了，即使上了车，人家不开怎么办？再说，就是坐上了车，平汉、津浦沿线戒备森严，我们也不可能安全到达目的地。倒不如骑自行车机动灵活，他们这儿堵，我们就往那边行，加以沿途经过广大农村，

正是进行抗日宣传的好机会，所以我们才决定组织自行车南下宣传队。

1935年12月20日前后，北平学生积极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我们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先遣车队征求队员。钱伟长同学当时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和知名运动员，在学校里颇有影响，大家就一致推他领衔，发起人还有高葆琦、曹国枢、沈海清、裴崑山等。启事贴出后，许多同学要求参加。

12月24日，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成立会在清华三院教室召开。校学生救国会派代表参加，并发了《罢课宣言》《告民众书》等一包宣传品和一些文具纸张。会上，我们讨论了行动路线、宣传工作、联络点，以及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经过协商，大家一致推举高葆琦为队长。当时，老高是土木工程系的，校足球队队员，体魄健壮，为人诚挚，勇于负责，遇事有股子冲劲儿。“一二·一六”时，清华的游行队伍到了西便门，城门紧闭着，为撞开城门他冲在最前面。他还是清华老交通车队的，两次游行时他都骑车跑前跑后，为同志们所熟悉，深受大家的信任。大家又推举裴崑山任后勤总务。老裴是气象系的，年龄较长，比较老练。在清华大部分学生是中等以上人家子弟的情况下，他为经济困难的同学办过“清寒学生食堂”，很会精打细算。大家还推举吴瀚管医护。小吴是历史系的，校球队运动员，是车队中唯一的女同学，她身强体健，为人朴实热情。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支由不同院系不同年级同学组成的自行车队，在同一志愿的激励下走到了一起。大家都

很兴奋、激动，怀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准备迎接一次非同一般的、可能充满艰险、也许是有点别开生面的宣传游行。

### 别具一格的送行

25日清晨，清华园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参加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同学，陆续齐集到大礼堂前，那时的学生平日大多都是着长衫、旗袍的，可这一天，大家都是一身短打扮，有的挎着水壶，有的还斜背着军毯卷儿，倒显得挺精神，就像行将出征的战士。有意思的是，大家的服装式样和色彩很不一致，又找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很像一支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部队。偏偏老裴又戴了一顶礼帽，更惹人发笑，联系到他管总务，大家就戏称他“裴老板”。只是他花12块钱买的一辆自行车不高明，除了铃铛不响别的都乱响。大家说：“你这老西儿（山西人），这破车怎么行？”他倒挺自信：“到路上，你们看我的！”只有徐煜坚一人带了打气筒，还有修车工具，显得很有先见之明。

许多同学赶来送行，以壮行色。有的脱下自己的皮手套，有的脱下厚棉鞋，不容分说地给我们换上，谢和声同学解下自己的羊毛围巾，硬给曹国枢系上。真是一片深情厚谊！

临出发前，没想到梅贻琦校长、叶企孙院长和秘书长沈履先生都同时前来参加送行。梅校长讲话，首先表示不赞成我们南下，但话说得很婉转：“自然喽，你们这是爱国行动。其实，表态嘛，不一定到农村去嘛！天这么冷，怎么行？”面对这样一支整装待发的队伍，他知道唠叨多了没有用。于是，把话锋一转：“一定要去嘛，

我也拦不住你们，只是路上要小心。”表达了对学生的关切之情。叶先生则一语双关地叮嘱我们：“路上保重，注意安全。”并亲自检视了我们每个人的行装。只有那位秘书长先生坚决反对，只是在此情此景之下，他也无法制止我们的行动。学校这几位领导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带着相互矛盾的态度来给我们举行“送行仪式”，别具一格地揭开了我们自行车队南下的序幕。据说在我们走后，梅校长还给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了一封“车队已出发、劝阻无效”的电报，以解脱他校长的责任。

### 抗日宣传的征程

整好队后，告别了送行的师友，老高就率队出发了。

四五十人的自行车大队，编成几个小组，排成一字长蛇阵，直奔南校门。出了校门，向东顺五道口、四道口、北太平庄，一直沿大车土道走下去。那时，这些地方都是郊外，尘土飞扬的大车土路就是阳关大道了。因为“一二·一六”以后，北平的城门口都增添了武警岗哨，像我们这样一支队伍难顺利通过，所以我们的路线是绕德胜门外、安定门外、东直门外、朝阳门外，顺着城根才上了公路。

田野上，阡陌纵横，遍地是秋收后的庄稼茬子和蒺藜稞子，大车道更坎坷不平，车辙就有尺把深，只要一掉进去，车子就蹬不转了。以致走了没多久，有些车子就出了毛病。加上冬天的寒风刺骨，飞沙走石，还没到朝阳门，有的同学身体就支持不住，退了下来。最遗憾的是车队的发起人之一，当时车队中仅有的一位救国会委员曹国枢同学的自行车，摔断了前叉子，迫使他停

## □ 口述历史

止前进，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谈起来，他还是追悔莫及，懊恼不已。一路上有陆续退队的，最后只留下 20 人。

绕过朝阳门往东，就是平津公路了。临近通州时遇上了一个伪官员（当时通州已是冀东汉奸政府的所在地）。他带着随从马弁，坐着小汽车狐假虎威的。可是，看到我们这一支队伍，他大概是摸不清来头儿，怕吃亏，吓得一溜烟似地跑掉了。

中午，随车队送行的同学林风、熊大缜、蒋宪端、傅国虎、孙湘、高潜等，直把我们送到通州，才依依不舍地转回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绕过通州县城，直抵香河。在此两个月前，即 10 月 22 日，日寇收买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等地的汉奸地痞，占领了香河县城，组成香河伪“临时维持会”，他们为虎作伥，抓人抢粮，老乡们深受其害。我们到香河时，看到县城小街陋巷，破破落落，凋敝凄凉。街上行人很少，只有一些瘦弱的老头缩在屋檐下，或躺或卧，有的在那里翻着裤腰捉蚤子。我们走上街心，招呼群众，借来凳子，站上去讲演，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痛斥汉奸的罪行，诉说亡国的灾难，唤起群众的斗志。老乡们听我们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南下征程中的自行车队队员们

纷纷围拢过来，亲热地同我们搭话，诉说他们的苦难。

离开香河县，日头已偏西了，不料近傍晚时，任泽雨和高崇照两位同学从后面赶了上来。原来，他们前几天被学生救国会派到保定去发动学校开会，受到军警的追捕，返校后才知车队已出发，遂急忙赶了上来，大家高兴地一同前进。到河西务时，天全黑了下来，待大家陆续到达，老高一点名，少了张石城、凌松如二人，他立刻和老裴顺着原路往回找，原来张石城在最后压队，过香河县摔了一跤，好不容易爬起来赶路，越走天越黑，又不识路，幸而遇着掉队的凌松如搭了伴。出了香河，他俩又被一个伪军警盘查了一阵，并安置在城墙外边一个小店歇夜。当时城外不断传来零星枪声，原来他俩就是被伪军警怀疑，才被送出城外的。店主说，小城并不平静，夜间抢劫、匪乱很多，天一黑城门就紧闭了。老高在小店找到他俩后，四人一齐归队。本来凌松如还是为参加车队刚学会骑车，所以一路上总是跌跌撞撞地常掉队，大家戏称他是“差劲儿”。但以他那骑车技术能随车队坚持下来，可以看出松如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他投身革命后，锻炼得英勇善战，指挥有方。1939 年，他任决死队二十五团政委，不幸在武乡县温庄“百团大战”中光荣牺牲。

河西务是大运河西岸的一个码头。夜幕中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生气。好不容易找到一户吹鼓手的人家，让我们住进一间房，在光秃秃的大土炕上我们和衣而卧。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就这样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 社会现实的教育

26日黄昏，我们到天津，直接进入北洋大学。原计划要在天津停留一天，同各大中学校同学联系、交流。北洋的同学热情接待了我们，为了安全，把我们分散安顿在各个学生宿舍里，还放流动哨，保护我们。可是没想到，天津《大公报》登出了清华学生自行车队南下宣传的新闻。半夜里军警就包围了北洋大学，企图制止我们南下，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立即冲出重围。北洋的同学，凌晨三点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叫起来，派了熟悉道路的同学，给我们带路，从学校的后门出来，一直把我们送出30多里路，到子牙河上才依依告别，我们继续前进。

冰封的河道，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因为大车道有时堵塞不通，我们就将自行车转到冰上骑行，轮胎摩擦冰面的嚓嚓声，像在为我们伴奏，使人感到比走在大车路上还坦荡。可是大自然的这条冰封大“路”并不理想，有时像搓板似的，有时又凹凸不平，一路总有人不时摔倒。

转到运河上不久，即近黎明，行进间只听“咔嚓”一声，高崇照同学不慎压破薄冰，掉进冰窟窿，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才免于没顶之灾。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小高连人带车救出来，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寒风凛冽，不禁瑟瑟发抖，得赶快找个地方给他烤火。大家爬上河堤，见附近有一家茅屋冒着炊烟，便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位老大爷，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去，经多次恳求，他见吴瀚是个姑娘，才允许她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老大娘一早穿着出去拾柴，大闺

女只好围些破棉絮蜷缩在炕角上。老百姓的这种悲惨生活，对我们这些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来说，真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大家面面相觑，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经过同老大爷协商，由吴瀚陪伴着闺女，只让小高一个人进屋烤火，大家都在门外等候。想到这一夜的遭遇，小高，还真是不幸之中有幸，这时不知谁说了句“密度计”，从此，这就成了小高的雅号。待到小高的衣服快烘干了，我们谢过老大爷继续上路。这一天，我们只走到静海县。

第四天到唐官屯，我们虽然只有四天行程，但这正是寒冬腊月三九天。河北大平原上北风怒号，刺透棉衣，走在乡间大车路的冻土上，坎坎坷坷，摇摇晃晃，比走马路吃力多了，又要全神贯注，往往要发一身热汗，很快又被冷风吹冻，贴在身上，倍觉冰冷。至于吃的，又常常为了赶路，啃些冷馒头或烧饼充饥，睡的土炕又小又挤，只能侧身和衣而卧，有时还根本找不到小旅店安身，很快队员中有人发烧病倒了。为了给病友借一条棉被，我们跑了几十户人家也没有借到，老乡们盖的都是烂棉花套。地理课本上告诉我们，河北省是盛产棉花的地方，为什么农民却连一条完整棉被都没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给我们上了极深刻的一课。

向南，我们继续在运河上行走。到沧州时，正值日本人要修沧石铁路，他们正在勘测线路，并任意占用农田，拆毁民房，挖掉坟墓……老乡们无不愤恨。我们结合老乡们的亲身感受，谈说华北的危局，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听我们一说，老乡们犹如干柴近烈火，怒火中烧。乡亲们一下

## □ 口述历史

子把我们看成是自己的子弟。我们还和当地学校联系，向他们报告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鼓励学校师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沧州以南，运河结冰较薄，我们转上公路，有时要沿着铁路边上的斜坡走，有点让人提心吊胆的，经泊头、南皮、东光、吴桥，31日傍晚到达德州。

吴瀚在沧州就开始发烧，但她无半点娇气，并且瞒着大家强忍病痛坚持跋涉。她这股顽强劲，使我们都很敬佩。一到德州，我们就赶紧送她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白喉，当即住进了医院，并电告她家里来人护理。

我们在德州度过了1936年元旦，学校都放假了，我们就到街上去宣传。有一位崇德女子中学的同学，听了我们的宣传，坚决要求参加我们车队南下。经互相介绍，原来她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叫张桂珍，谈起对日寇的仇恨，谈起背井离乡的苦痛，真是情真意切。经过讨论，我们一致同意接受她入队。

为了使张桂珍做些准备，我们在德州多停留了一天，谁知这一天，竟意外地等

来了曹国枢。老曹是我校学生救国会的骨干。他因自行车的前叉子摔断返校后，梅贻琦校长知道了，学校便派他奉梅校长之命来“动员”我们回校。原来学校收到了南京政府的两封急电，指令学校立即制止自行车队南下。梅校长既怕学校为此出事，又担心我们在路上吃了亏，他认为曹国枢最能跟我们说上话，所以让老曹来追我们，告诉我们这一情况，力阻我们继续南下。并且为了让我们迅速返校，还给我们带来了100元路费。老曹接受了梅校长的任务，愿赴此行，但表示不一定能说动我们，他便乘火车一路赶到这里。谁知这天，紧跟着又来了第二位使者——张龄佳。张老师当年是全国十项运动冠军，毕业后留校任体育教师。我们车队中有好几位运动员，老高和他就同是学校足球队的高手，所以知道他来是正式为学校作说客的，张老师自己也不否认。他劝我们，但并不为难我们，甚至还表示些同情，我们并不为他所动，他就先去济南了。

1月3日，我们即将离开德州时，曹国枢把梅校长给的100元路费交给老高，大家都不愿接受学校的资助。曹国枢说：“这是梅校长让你们返校的路费，你们现在不用，到南京后不是也得返回学校嘛！”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笑。

后来知道，曹国枢回校复命后，梅校长叹道：“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又不回来，南京会有人说我们学校资助自行车队去闹事的。”对梅校长的说话处事，同学们都是十分清楚的，估计他有可能又会发出一封“再次劝阻无效”的电报给南京，或者寻找机会进京，当面表白一番。另一方面，由于他平日一贯对同学们的同情关心，却



自行车队在沧州中学门前

也赢得了全校学生的谅解和好感。

几天来，我们穿行了几百公里，经过无数村镇，到处是穷困凋敝，人民蒙受重重苦难，使我们在这所广阔的社会大学里补了重要的一课。

### 接受新任务——抗议“聆训”阴谋，反对分裂学生运动

从北平到德州，在我们所经过的村镇道口，甚至于荒郊断壁上，都有日本“味四素”、“仁丹”的大幅广告画，极为触目。

“七七事变”后才知道，那是日本特务深入我国腹地所作的军事路线标志，令人震怒而痛心。经过长途的实践，我们的骑车技术都大为提高，加上两天休整，精神更加抖擞。离开德州后，准备兼程100多里赶到济南，谁知出城以南没有大道，只能沿着铁路的边道走，到桑梓店已是下午六点，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竟是一片黄河滩，前后左右一片漆黑，这时只能借着天上微弱的月光，在铁路旁反映出来的白白一条细缘上摸索着前进。这里离洛口不过20公里，却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直到午夜才赶到黄河铁桥。

黄河铁桥是不能任意通过的。刚接近桥头，只听对面“哗啦”一声拉响枪栓，黑影里有人大声喝道：

“口令！”

老高等几位上前交涉，僵持了一两个小时也没解决，这时朔风凛冽，原先跑路出的汗现在凉了下來，再一冻，真是沁透心脾。幸亏那位作“说客”的张龄佳老师先期到了济南，听到了我们的难处，找熟人打通了关节，才放我们过了铁桥。张老师没有成为我们的阻力，反倒成了助力。

到济南，我们先在车站附近找个小店住下，然后直接摸到齐鲁大学。在齐鲁，遇到了一位从燕京大学转学来的同学，竟是车队陈冠荣同学的朋友。他特别关心北平的学运，他帮助我们组织齐鲁的同学分成几组，分别在几个大教室举行座谈，让我们介绍北平学生运动情况，南下宣传目的。齐鲁的学生是山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起者，很有革命精神。同学们说，韩复榘这个土皇帝用高压手段摧残学生运动，因此开展抗日宣传很困难，牺牲很大。车队的到来，给他们以很大的鼓舞，增强了斗志和信心。大家座谈得很热烈。

回到小店，还不待我们合上眼，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派秘书来传话，要“召见”我们。我们表示，坚持不去。

清晨，街上盛传昨夜韩复榘用武力把齐鲁大学解散了，学生全部被驱逐出校。这使我们万分愤慨。这时，忽然又闯进来两个人，一是宫日健，一是刘江陵。老宫也是借着替学校“劝阻”我们的名义赶来的，实际上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位清华负责人，也是老高的同班同学，最支持我们的行动。刘江陵则是代表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来向我们正式布置新任务的。原来蒋介石已于去年12月末电令全国专科学校，每校派学生代表1至4人，由校长、教务长率领，到南京“聆训”，限1月14日前到达，15日正式开会。1月初，北平各校当局都指派了进京“聆训”的代表，各校同学纷纷提出抗议，称这些未经学生推选的“代表”为“伪代表”。刘江陵带来了许多报纸，《北平晨报》《大公报》《益世报》都登着北平各校学生抗议伪代表的



声明。北平学联考虑到我们车队既已到济南，决定要求我们15日以前赶到南京，代表学联抗议指派伪代表，揭露蒋介石以搞“聆训”破坏爱国学生运动的阴谋。这样，我们不仅是在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备案的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而且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代表了，任务明确。这时我们更是斗志昂扬，信心倍增，一定要争取时间，早日赶到南京！

何思源，一个穿着长衫革履、40来岁的官员，在秘书、警卫的簇拥下，亲自到小店同我们谈判来了。他先是假惺惺地说：“你们既来了，可以安排参观参观，愿意玩可以玩玩。”但转瞬间就换了腔调：“不过，山东的秩序不好，出了事，我们负不起责任”。后来，他干脆提出三条：

1. 限三天内离境；
2. 只要不在山东境内停留闹事，往北还是往南，悉听自便，可负责送上火车；
3. 可奉赠数百元。

我们没有正面回答他，而坚决抗议他们解散齐鲁大学！我们说，不答复这个问题，别的什么也谈不上。

看来，对此何思源也作不了主，他往返跑了好几趟，同他的主子反复磋商，最后答复：齐鲁大学不是解散，算是提前放假，寒假后照常上课。又说：山东是韩复榘的势力范围，蒋介石管不着，只要出了山东，往南往北他们也不管了。这样，我们才表示，三天后继续南下。至于他们“奉赠”的数百元，我们捐给黄河赈灾委员会，请黄委会转给灾区人民。为此，我们还在济南的报纸上专门刊登了启事。

7日，我们连人带车，被“护送”上了开往徐州的列车。车站上增加了岗哨，

士兵还背着大刀，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上车，凌松如就怒不可遏地操着四川口音说：到大汉口非下车不可。但是大家又一计算，若要15日以前赶到南京，执行新任务，时间已很紧迫，坐火车一天可顶自行车六七天的路程，这条件，不是正该利用吗？这么一想，大家也就心平气和，做好休息准备。

### 老百姓也是要抗日的

我们在徐州停留一天。家住徐州的武衡同学，情况比较熟悉，对我们在徐州的宣传活动起了很好的协助作用。当时徐州的学生运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很有起色。这对我们的活动很有利，取得的宣传效果也特好，而徐州中学校长严晓帆先生，原是钱伟长在苏州中学读书时的数学教师。严先生有一颗爱国丹心，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休息和用餐。真的，自从出发以来，我们还从没有这样吃过一顿热菜热饭呢！严先生还在操场上召开大会，介绍我们同全校师生见面。我们的几位队员，分别讲了平津学生的斗争、华北危机、反动派对学运摧残、南下抗议伪代表“聆训”、车队沿途十几天来的见闻，等等。我们讲得很激动，场上的情绪也很热烈，不时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反动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阵阵呼声。会后，同学们一下子把我们围起来，问长问短，我们则鼓励他们积极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同时，我们还派了张石城、徐煜坚等队员到徐州省立女中去，女中的孙媛贞先生叫进步学生赵仲英、李素兰通过学生会骨干召集全校同学听我们讲演。她们有的哽咽抽泣，有的义愤填膺，

有个叫沈玉珍的同学竟领着大家呼起口号来。接着她们就地组织起几个小队，准备进行抗日宣传。当我们离开徐州时，有些同学要跟我们一起走，可惜我们任务重，时间紧，不能带上她们。

徐州以南，大水灾之后田园荒芜，道路淤塞，车子很不好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个魁梧强壮的汉子骑着车子老尾随着我们，总是相距十几米，若即若离的。只见他头戴毡帽，脚脖子上扎着裤角儿，身穿棉袍，束着腰带，半撩着的棉大襟斜掖在腰带上，腰里左右各插着一支张着大机头的匣子枪。遇到村边、路口，他还抢先上前了望。他到底是干什么的？真让我们迷惑不解。

老高嘱咐大家沉着气，不可轻举妄动。

我们继续前进，在离宿县不远的时候，那汉子赶上前来同我们聚拢在一起，只见他双手打拱，操着苏北口音说：“知道你们是宣传抗日的学生，特意陪送一程，前边就不是兄弟的地面了，路也好走了，还望各位弟兄好自为之。”说罢叹了口气：“哎！老百姓绝不能忍受日本鬼子的糟害，也是要抗日的啊！”他显得一副北方农民的憨厚神情，长方的面孔一道浓眉下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目光凌厉，态度诚恳。说罢，连姓名也不留，转身上车向北飞驰而去。

过宿县后，老高的自行车坏了，张石城陪他在西寺坡站的小店里留宿。第二天修好车，他们赶了上来，说昨夜里听到枪声，还发现有可疑的人进出小店。原来这一带是土匪窝儿，怪不得那位江湖侠士要护送我们。

再往南走，大水还未退，只得折向东去，到灵璧，过唐河支流和沱河后，再折向西南，

到固镇车站。这样，绕了一个大弯子，自固镇到蚌埠，已是11日晚上，为了赶时间，我们决定乘一段火车到滁州，争取14日以前赶到南京。在中途小车站乘车要买20多张车票，还要带20多辆自行车，颇非易事。多亏站上的职工同情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给了我们极大支持。不仅卖票给我们，而且还让我们把自行车分散放在各车厢的两头儿，顺利成行。我们真是感激这些工人兄弟，同时，也多亏了梅校长给的“路费”。

### 战斗在反动派的心脏

13日清晨，我们骑车从滁州直奔浦口，因道路被大水冲淤，仍只能沿铁路旁的边道驶进，有时就走在45度的斜坡上，行人又拥塞，路很难走，我们心里急如火燎。

到浦口后，南京已在望，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没有在码头上乘轮渡，而是混杂在商贩和货车的行列中，在下游乘了一只木帆船，渡过长江。后来听说果然特务们等候在码头上。不料我们来了个“暗渡陈仓”，竟蒙混过来了。

经过1300多公里的艰难征程，我们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南京！

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闹市，我们被拉客的招待在新街口的新亚旅店住下，这是两间“统舱”，中间的隔墙是半截子板壁，这种房在南方原是常见的，并未发现可疑之处，房间倒还干净，价格也便宜。安顿好后，我们趁天不黑，立即去中央大学，找到出发前纪毓秀给介绍的同学杜永康。为了安全，他们把我们带到女生宿舍，又从食堂打来饭，我们就边吃边谈。他们讲了近半月京沪各地学生斗争的情况，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学校已提前放假，

## □ 口述历史

学生运动已转入“地下”。车队的到来，使他们特别高兴，并嘱咐我们更应多加小心，这里是一片白色恐怖，说蒋介石曾声言“抗日有罪，杀无赦！”还告诉我们伪代表们住在某大饭店。我们商量了共同行动，当即拟了抗议伪代表的宣言稿和抗议书，……恰在这时负责警戒的同学来了。

“快走，军警来搜捕了！”

中央大学的同学帮我们立即转移到金陵女大去，在一个小礼堂里，我们又摸黑开了一个约200余人的会，虽然大家素不相识，又相对不相见，但抗日救国之心是相通的。

回旅店后，老高同大家商议：明日是伪代表“聆训”前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必须加紧行动，商定一组上街宣传、抗议、散发宣言传单；一组到伪代表集中的饭店去分发抗议书。裴崑山派小徐、伍崇让和高崇照设法到街上印宣言和抗议书，他们居然找到一家小印刷所，乐于承印。三人很得意地抱回来印得又好又便宜的传单，大家都交口称赞。

14日清晨，我们分别骑车，带着传单出发了，到大饭店去的一组，依次从门缝里把一张张的抗议书递到伪代表们居住的房间里去，正送着，在一间房门口，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推开门一看，原来正是我们要找的清华大学的伪代表，他们共来了四个人，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呢，沈海清首先闯进去，我们就向他们提出质问：“你们是谁的代表？”

“清华的同学没有选你们，你们不能代表清华的同学！”

他们傲慢地大吵：“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就是来揭发、抗议你们这批伪

代表‘聆训’的！”

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

梅贻琦校长闻讯赶来，他这边劝劝，那边说说，只图息事宁人，我们则坚持表示抗议！抗议利用“聆训”来破坏学生运动！这四个人是“伪代表”，不能代表清华的广大同学！……

我们十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满街跑，撒传单，冲击伪代表集中住宿的饭店，在南京那样敏感的城市里，一时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活动，给南京各校的同学以有力的声援。中大、金陵的同学紧张奔走，同我们联系，准备明天到国民党中央礼堂去冲“聆训”大会。

### 反动派的“绑解出境”

14日中午，突然来了大批军警，包围了我们的住处，声言要抓带头闹事的。我们手挽着手，边争辩，边喊道：

“要抓一块抓！”

“我们都是学生，没有带头的！”

我们一齐用力往外冲，但终于被军警挡了回来，结果，虽然谁也没有被抓走，但实际上我们都失去了自由。

教育部的代表雷专员来了，他也是先花言巧语一番，说什么“你们来到南京，愿意到什么地方参观，可以安排”。然后说：“你们不是说政府不抗战吗？请你们到军官学校去参观参观，亲自看看政府对抗战准备得怎么样了，不好吗？”我们当然不去看，看什么？不看也知道你们是准备了，但不是准备抗战，是准备打内战。

我们完全失去了自由，度过了愤懑难忍的一夜。

15日，也就是反动当局召开“聆训”

大会的当天清晨，在我们住处又开来大批宪兵，他们不容分说，先封锁大门，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由两个宪兵强行挟架着从后门离开旅店，怕给外面群众看见他们的凶蛮行为。这时，附近街上已经戒严，旅店门外停着军用大卡车，宪兵逐个押送我们上车，我们一边挣扎，一边呼喊：

“我们是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们是要求抗日的！爱国无罪！”

“你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我们！”

“反对伪代表聆训！”

“宣传抗日无罪！”

“打倒卖国贼！”……

我们大喊大叫，宪兵们只是一声不响地执行任务，他们两个对一个地拽不动我们，就四个人拽一个，把人拽完了又把我们的自行车和衣物等统统塞进车里，然后，开车疾驶而去。

后来听说，当时中央大学的同学曾经赶来声援我们，半路上也被军警驱赶回校，张石城的哥哥也从外地赶来南京找他，受到军警的拦阻不得近前，他不得已又赶紧把军警抓捕情况，电告在南京开会的梅贻琦校长，才把情况扩大张扬出去。

张石城的哥哥，为什么要专程赶来南京找弟弟？原来这也是清华大学校方的一招，就在我们离校出发后，学校当局给我们每家发出一个通知，大意是该生不听劝阻，参加南下宣传，自由行动，校方不负安全责任，等等。家中不放心，才赶来劝阻的。这个小动作，小插曲，不知是出于校长还是秘书长之手！

卡车在飞驰，我们在车中仍不停地叫嚷抗议，宪兵们依然默默无语。会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估计会关进监狱吧，谁知

卡车忽地嘎然而止，横在眼前的却是滚滚长江。我们立刻喊道：“不回去！”“我们不回去！”

为了不让人民看见，码头上完全戒严了。宪兵们又照样把我们扭送进一只空空的大轮渡船底层的大货舱里，专门把我们载送北岸。到浦口，又用卡车把我们送进一个门很小、很不显眼的大院子，院里有一栋孤零零的楼房，宪兵把我们关进三楼上的一间大空屋子里，窗上还装着铁栏杆。这样，我们既跳不出去，喊叫也无人听见。楼下还堆放着许多木柴。一个宪兵官儿说，要把我们“押解回北平去，不走就放火烧死灭口。”我们知道，清华大学自行车队被武装押走的事已经闹开了，纸包不住火，反动派想制造“失踪”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威胁恫吓，无非是要逼走我们。我们仍然叫喊抗议：“不回去！”“不回去！”

晚上，宪兵送饭来，我们不吃，还同他们讲理。他们只是说：“吃吧，不吃肚里饿得慌。该吃就吃，该干什么干什么。”

当晚，南京教育部司长雷震还带来几个人，花言巧语，威胁诱惑。由于未得结果，讨个没趣悻悻而去。

16日清晨，又增加了一批宪兵，再次绑架式地挟持我们上到一节北上“专车”上。车上没有别的乘客，只有一百多名宪兵，我们每一个人，都由四名宪兵警察护卫着，左右各一名，对面两名，并且持枪相向，如临大敌。我们的自行车则被安放在货车上，他们似乎生怕我们有了自行车就长了翅膀似的。

火车沿津浦路北驰，一站不停，直达徐州。下车后，把我们押送徐州宪兵司令部，严格限制我们的自由，绝不许外出活动。

17日，换乘陇海线客车西行。我们直纳闷：为什么不直接北上，却要改变路线呢？后来知道，是蒋介石的军营进不了韩复榘的山东。在车上，我们同宪警们相处的时间一长，他们也松懈了，个别人就慢慢地同我们搭话了。他们说，他们也是军校的学生，同情我们的抗日宣传，但不能不奉命“执行任务”。据他们说，我们在南京所住的新亚旅店也是他们的据点之一，我们在“统舱”里谈话、开会，他们就在半截子板壁后边偷听，就连给我们印传单的那家小工厂，也是他们设下的圈套！我们听了，都感到反动当局这一套勾当太无耻，裴老板和小徐、小伍、小高更是气愤不已；但同时也认识到新军阀在对付学生运动上，比起旧军阀来，更有其奸诈阴险的一面。

车到郑州，照例我们又被押到宪兵营部，办了换车手续后，我们又被押送上北去的列车，自行车全被锁在货车里。至此，宪警们就不再“护卫”我们，为我们“送行”了。因为根据《何梅协定》的规定，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营是不准越过黄河一步的。一个如此凶顽的反动政府，如狼似虎地对付青年学生，在民族大敌面前却如此卑躬屈膝，这情况更使我们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

登上北上的列车之后，我们可以自由了。自行车队的旅程已近尾声，回顾此行，大家十分珍惜这次特别的征程。我们骑单车千里南下，又乘“免费”专车而归。一路遭遇虽然惊险迭起，却也广见了当今中国之“大千世界”，启人反思，教诲良深。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那北洋大学同学凌晨送行的脚步，那沧州街头老乡们赞许的目光，那东北流亡学生恳切的追求，那江湖侠士的义举，那中央大学同

学们难能可贵的声援……这些都给我们以无限的鼓舞。

### 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1月21日，车队出发后第27天，我们回到了清华园，正巧吴瀚也回来了，原来她在德州出院后，12日赶到南京，找着杜永康，知道我们还未到，她就趁空回了常州，待她回京，我们已被押走，她急忙乘津浦路火车返校。当时学生救国会让我们向全体会员汇报了南下的经过，梅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动和表现，得到了广大同学的了解和赞许。这时，我们才见到北平学联发表的《为反动派代表进京“聆训”告民众书》。我们自1月5日在济南接受了刘江陵代表北平学联交给我们的赴京抗议伪代表“聆训”的任务后，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北平学联《告民众书》的精神，现在看到了北平学联的正式文告，好似这字里行间也溶进了我们自行车队的行动和意志，就像一条条细流汇进了澎湃的巨川一样。

自行车队南下队员之间的革命友谊，经历了实践的检验。经提议，我们正式成立了“车社”，除原车队发起人、南下队员外，还有许多同学也参加了。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车队”全体随后又参加了由陈垣、刘毓珩、王天眷、郭建恩等同学共同发起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不久，南下宣传团从高碑店返校后，地下党考虑应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纪毓秀代表党组织找裴崑山和吴瀚分析形势，说明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党组织又派曹国枢促成其理，经过他们分别同队

员交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和“救亡团”一起集体参加“民先”。

1936年春季开学后，先是由雷骏随（李昌）在旧大楼“清华学堂”（一院）二楼东翼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民先”的成立大会。“车社”成员集体出席。会上，

选出雷骏随、高葆琦、凌松如、董凌云、纪毓秀为负责人，雷骏随为清华“民先”的大队长（雷调离北平“民先”总队长后，纪毓秀继任）。从此，我们积极参加“民先”的一切活动，在党的指引下，走上更加广阔的新的革命征程。

### 附：清华大学南下自行车宣传队队员名录

钱伟长（研究院 物理），郝威（罗青）（1936 外语），高葆琦（高原）（1937 土木），裴崑山（彭平）（1937 地学），张石城（1937 级电机），陈冠荣（1936 化学），吴瀚（1937 历史），誉问德（1937 化学），高崇照（1937 地学），戴振铎（1937 物理），梁伯龙（1937 化学），任泽雨（赵心斋）（1937 地学），徐煜坚（1938 地学），黄克新（1938 化学），黄渤海（1938），沈海清（林一民）（1939 经济），凌松如（凌则之）（1939 电机），高仕功（1939 气象），伍崇让（1939 电机），郑仁圃（1939 化学）

（刊载于《纵横》2000年3期、4期，2015年12月吴瀚女儿刘爽提供）

## 王笠耘、袁榴庄夫妇的清华情怀

○袁榴庄（1949 经济）、袁叶口述 杨帆整理

王笠耘（1927—2008），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同年冬天，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为纪念惨案中牺牲的四位烈士，于1946年转入外国语言文学系，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反映那个时代的小说《同命人》。1951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该出版社的元老之一。1955年担任现代文学部北方组组长，在工作中始终致力于帮扶边远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学事业，仅内蒙古一地就采风二十余次，被誉为内蒙古文学的“奠基人”。一生编辑出版著作200多部，著有中篇小说《春儿姑娘》，长篇小说《她爬上河岸》，理论专著《小

说创作十戒》，诗集《心花飘香远方》等。

袁榴庄，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曾是学校排球队队长。1951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是该出版社的元老之一，也是现代文学部唯一健在的元老。在工作期间共编辑出版了60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1973年，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屏，剧中小海霞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蔡明。

2015年9月，编者有幸在“一二·一”运动70周年之际采访到了袁榴庄学长和他们的女儿袁叶。这对清华伉俪的故事就在母女二人的讲述中慢慢呈现。